

共同富裕视阈下跨地区生态扶贫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安吉县和德清县的类型分析

程悦¹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浙江省的信任和重托，将成为浙江省“重要窗口”建设的新亮点。浙江省安吉县和德清县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形成“农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和“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两个各具先进、有独到之处的跨地区生态扶贫经典案例。通过对两县案例实践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以期在生态扶贫中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现实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共同富裕 跨地区 生态扶贫 类型分析

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然而，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贫困是动态而非静态，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同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浙江省的信任和重托，是浙江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将成为浙江省“重要窗口”建设的新亮点。

一、共同富裕和生态扶贫

学术界普遍认为“共同富裕”与小康社会思想、共享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自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共同富裕”并做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后，相关学术研究明显增多，但仍集中在理论探讨层面。生态扶贫是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通过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双赢”。总体而言，现有的关于生态扶贫的学术研究多从规范性、运行的内在逻辑等角度，多偏向理论分析，而“共同富裕”侧重于内涵意韵、发展沿革，地方实证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就是在“共同富裕”新的视角下，从“应然”学术研究转向以更系统的思维观照现实。

共同富裕和生态扶贫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共同富裕和生态扶贫在民生追求上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在后扶贫时代强调共同富裕，这既是对脱贫工作成绩的肯定和巩固，也将更加关注共享理念下富裕的系统性、整体性。“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在“共同富裕”的视阈下研究生态扶贫，是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环境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民生诉求。第二，共同富裕和生态扶贫是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扶贫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共同富裕与生态扶贫、绿色发展的共促进程将进一步激发地区间经济活力和创新力，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石。第三，共同富裕和生态扶贫的实践和理论相互推动和深化。共同富裕视阈下生态扶贫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为破除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两难困境提供有效路径，将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

基金项目：2022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编号2022N104）

二、共同富裕视阈下跨地区生态扶贫的类型分析

浙江省安吉县和德清县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都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为媒的跨地区、宽领域、多维度又特色鲜明的共同富裕之路。

（一）安吉县“农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跨区域生态扶贫

浙江省安吉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安吉县所辖的黄杜村靠种植白茶致富，“先富帮后富”，2018年向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五县贫困地区捐赠1500万株白茶苗，助力精准扶贫，后续通过现场和网络远程开展茶苗种植、培育、采摘、加工等一系列技术指导。2019年以来，安吉县在捐赠茶苗的基础上，联合三省五县以茶为纽带，共建“三大联盟”，探索长效机制助推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

1. 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建联盟。随着“白叶一号”茶苗在西部三省五县落地生根，安吉县黄杜村发起成立了“白叶一号”乡村振兴党建联盟。黄杜村党总支与结对扶贫村党支部签订结对共建协议，共同抓好党组织制度建设、党建工作目标制定与监督实施以及产业发展规划、人才资源发挥等方案制定，全面增强联盟内各村党建引领力、村庄发展力、产业驱动力、文化吸引力。

2. 以经济共富为目标，组建产业联盟。由中茶所和三省五县（后发展为四省六地）的农业部门（茶办）共同建立“白叶一号”产业发展联盟，为各地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持，集聚区域产能、推动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共享、产业共兴。

3. 以精神共富为指引，建立学习联盟。从黄杜村“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到“千里扶贫、一叶传情”，再到“一片叶子致富八方百姓”，黄杜村“一片叶子的红色历程”实践就是一部可学习可借鉴的鲜活教材。支部结对互勉共学，扶贫结对的六地党员借助视频会议、云上课堂等形式，开展学习研讨及经验交流。

在2020年2月份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安吉县黄杜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安吉县“农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跨区域生态扶贫实践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赞誉，习总书记指示：“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

（二）德清县“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生态扶贫

浙江省德清县是“洋家乐”乡村民宿新业态发源地，被《纽约时报》评为“全球最值得去的45个地方”之一，并入选“世界十大乡村度假胜地”。非疫情影响的正常年份，如2019年，德清县共接待游客2210.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14.98亿元。自2015年与四川省木里县结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县以来，德清县累计拨付财政资金5000多万元，涉及援建项目30余个。

1. 政府引导，探索共富机制。旅游扶贫是一种崭新的集约型扶贫方式，对顶层设计有着很高的要求。德清县推动木里将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及首位产业和主导产业去发展。两地在县级层面共同签订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将两地文化旅游的资源条件、市场条件、配套条件和文旅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统筹考虑，指导木里制定完善的文旅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德清县文化旅游部门行政职能与文旅集团的产业发展职能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及权责匹配方式对于木里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2. 引入市场，强化共富主体。共富应注重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作用，而“扶贫”并非游客旅游消费的首要目的，重点在于打造旅游产品高质量供给。基于此，2019年起德清县文旅集团出资2000万元，联合木里巴登拉姆农投公司共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集住宿、餐饮、商务、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木里花园全季酒店，项目建成后，有效地弥补了木里酒店资源短板。德清县还引导浙江丰厚的民间工商资本去投资木里开发，推动木里当地有条件的村镇联合开发，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3. 产业聚焦，推动共富落实。资源配置聚焦生态旅游。生态扶贫的对口旅游项目存在开发广、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往往造成资金“撒胡椒面”，如实施进度缓慢造成专项资金闲散、少数项目实施完毕后结余资金未作安排等，使旅游扶贫的专项资金难以发挥应有的规模效益。德清县生态旅游产业帮扶资金，集中力量投入到前期申报论证充分、方案科学可行的项目中，简化旅游专项扶贫资金审批环节和手续，鼓励被扶贫地区的贫困户共同参与共同投资项目，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共享文旅建设成果。

4. 输出标准，分享共富理念。德清县民宿产业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对于木里发展民宿产业可提供精准的指导帮扶。目前，德清县累计出资 450 万元作为木里民宿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由企业捐赠精品家具，莫干山镇邀请专业设计师负责木里民宿整体设计方案，联合木里打造具有木里元素的民宿样板间。同时，德清县民宿行业协会在市场维护、对外交流、资源整合等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德清县民宿协会结对木里 80 余家民宿，提供系统化的建设、管理、服务、协调体制等指导，提高和改善木里旅游服务与接待能力，助力木里旅游品牌打造和游客引流。

德清县对四川木里提供的行业标准、技术、人才等多点支撑的“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生态扶贫，是一种崭新的集约型扶贫方式。

三、安吉、德清两县的跨地区生态扶贫实践蕴含的“共同富裕”理念

新时代讨论共同富裕，是更注重全面性和多样性的“富裕”。安吉、德清两县的跨地区生态扶贫实践贯彻了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部署，并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一）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注重经济和精神齐头并进的富裕

安吉县“农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和德清县“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两种扶贫模式都突破了传统扶贫“给钱、给物”的片面思维，更注重以“物”为纽带的整体性、持续性推进。比如，安吉县在捐赠茶苗的基础上，成立专项发展基金，由安吉县农商银行每年捐助 30 万元作为专项基金，用于白茶产业联盟日常工作运行。考虑到农产品种植受自然环境和技术因素影响较大，“扶贫先扶智”，安吉县与白茶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签订协议，持续为生态扶贫地区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攻关，解决“白叶一号”生产过程中碰到的各类技术难题，共同研究制定“白叶一号”产业发展近期和中长期目标。为保证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有效转化，安吉县还与扶贫地区开展白茶联产共销，成立农产品合作社和“一片叶子手牵手”合销超市，在安吉县农副产品展示馆、浙北超市设立专柜，共同销售“白叶一号”等四省六县名特优农产品，并联合拓展销售，扩大“致富茶”“友谊茶”销路，促进产业联盟合作成果转化。现代生态旅游绝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要素的简单堆砌，德清县注重发挥其文旅产业先发优势，先发带动后发，向对口扶贫地区提供民宿产业完整的行业示范和标准化体系，帮助挖掘对口扶贫地区特有的生态资源，将木里的生态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实现生态旅游与文化、产业、体育多领域深度融合，激发了木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可见，跨地区生态扶贫是经济和精神整体性协调推进的共同富裕。

（二）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注重经济和生态均衡发展的富裕

现有的对“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探讨，多囿于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经济价值转换，而忽略了“绿水青山”的非经济属性，未被货币量化不代表没有价值。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安吉县多年的绿色实践和“生态产品+三大联盟”整合型生态扶贫方式，以及德清县“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生态扶贫方式，深化了人们对“绿水青山”自然属性所具备的珍贵价值的理性认识，加深了追求共同富裕中对“富”的本质理解。总之，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要避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时指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一味向自然索取；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努力实现两者的平衡；第三个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三个阶

段是传统发展之路的必经过程。然而，“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跨地区生态扶贫为拥有良好生态却经济相对贫困地区跨越前两个阶段，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提供了创新性实践路径。

（三）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富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发展的根本遵循。安吉县以“支部联建、产业联兴”的方式，实现“人才联用、资源联享”，产品和技术输出为表，加大对扶贫地区人才培养为本。安吉和扶贫地区以互派金牌导师、乡村振兴指导员、一线跟班学习员“一导师两大员”的方式，围绕推动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做优村庄环境、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互学互鉴。四川木里旅游业发展受人力资本约束较大，德清县“生态产业模式输出”型扶贫模式注重人才帮扶合作，通过开设致富带头人培训班、职业技能培训班以及德清县民宿协会开展民宿产业指导等方式，帮助培训木里旅游业从业人员。德清县还通过挂职干部或结对帮扶责任单位现场指导，委托高校、旅游企业专题培训、实地交流和线上指导、提供“以工代培”就业平台等多种途径，鼓励和支持贫困群众从事旅游经营、开展接待服务。德清县还引导木里贫困户就业，赠送德清县洛舍镇地方特色钢琴、组织钢琴培训，探索出一条钢琴产业带动就业、钢琴培训提升修养、钢琴文化增强自信之路，充分释放“扶贫、扶智、扶志”三大红利。

（四）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扶助和被扶双方互为成就的富裕

共同富裕理念不仅是经济数据，其本质蕴含公平正义。安吉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其自然承载力是有限的，与其他生态资源良好的省份开展合作，是为培植优育生态农产品，延伸生态产品链，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生态旅游追求差异化美感，德清与木里的旅游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德清县与木里县共同制订合作方案，推动生态与文旅相融合的多元化产业共建。德清县深入挖掘和开发木里县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色资源，将民族、民俗、非遗文化合理植入乡村旅游中，助推木里金矿、水电站、牧场、林场、农林业发展特产园区，增加环保内涵，提升旅游产品附加值。宣传推广方面，开设“德清县—木里”旅游推广季，面向长三角地区，联合推出联建的旅游品牌，在德清县主要旅游客源地或旅游集散中心播放宣传片，宣传木里“洛克九百里”、香格里拉“四色钻石”等生态旅游线路。

四、结语

在共同富裕视角下，对“跨地区生态扶贫”进行类型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安吉县和德清县不仅是生态良好的经济百强县，也是浙江及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湖州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8:1，生态和经济、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体现“共”的本义。二是共同富裕不仅是扶“贫”的经济指标，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两县既是扶贫，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体现和输出，助推被扶贫地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人的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既是结果，也是过程的实现，两县生态扶贫主旨始终围绕“人”，让被扶贫地区人民更具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四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对生态环境优良的贫困地区提供跨地区生态扶贫，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生态富”理应成为“共同富裕”的考量因素，为“共同富裕”理论框架形成奠定基础。

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示范引领。浙江作为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理应为全国共同富裕提供示范。诚然，共同富裕的模式并不是统一的，需因地制宜；但是，浙江安吉、德清两县的“跨地区生态扶贫”模式对于其他地区或更高层面统筹推进构建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参考文献：

[1]赫军营.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路径[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31(05): 17-21.

[2]胡振通,王亚华.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01):168-180+206.

[3]雷明,姚昕言,袁旋宇.地方生态扶贫内在循环机制的优化——基于贵州省扶贫实践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4):152-162.

[4]丁智才,陈意.内源式发展:后脱贫时代生态型脱贫村产业选择[J].青海社会科学,2020(06):71-76.

[5]朱冬亮.贫穷的本质:基于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考[J].人民论坛,2020(Z1):86-93.